



□ 汪建新

南朝钟嵘《诗品》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古往今来，叹春、咏夏、悲秋、悯冬的诗词不计其数，四季不同景观引发文人骚客万般感慨，揭示出人与自然之间的感应与互动。诗人毛泽东善于咏物抒情言志，对春夏秋冬不同景致情韵有诸多吟咏，与历代诗家既有同声相应，更有别样格调。

春： 春风杨柳万千条

毛泽东标明写于春天的作品有三首，其中《贺新郎·读史》属咏史之作，与季节无关。《菩萨蛮·黄鹤楼》中“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勾勒了1927年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峻形势，描绘内心难以平复的激荡心潮。《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中“万木霜天红烂漫”“雾漫龙岗千嶂暗”，正值冬春交替，但因第一次反“围剿”战果辉煌，并无冬日肃杀，却有温馨如春的暖意。毛泽东没有对春花春雨的细腻描写，但四季之中，带有“春”字的诗句最多。《四言诗·祭母文》“养育深恩，春晖朝霭”中的“春晖”，源自孟郊“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五古·挽易昌陶》“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采桑子·重阳》“不似春光”“胜似春光”；《七律·和周世钊同志》“春江浩荡暂徘徊”，这些“春”字寓意着春天万物复苏、大地回暖。《卜算子·咏梅》中“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春”既指轮回交替的季节，又寓指自然美景和人世繁华。而《念奴娇·昆仑》中“阅尽人间春色”以及《七律二首·送瘟神》中“春风杨柳万千条”，则完全超越了对自然的咏叹，赋予春天新的蕴涵、新的立意。“春色”是人类历史的沧桑巨变，“春风”是新中国万象更新的形象代言。

夏： 热风吹雨洒江天

毛泽东标明写于夏天的作品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清平乐·会昌》《浪淘沙·北戴河》四首。前三首作品侧重描绘中央苏区武装斗争的紧张与凝重，但“赣水苍茫闽山碧”“雨后复

斜阳，关山阵阵苍”“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等诗句也表达了毛泽东对根据地壮美河山的一片深情。《浪淘沙·北戴河》中“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写出了北戴河夏天大雨倾盆，雨声如鼓、浪声如雷的恢宏气势。《七律·登庐山》中“热风吹雨洒江天”，是夏天独有的气象。在《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念奴娇·井冈山》中，毛泽东对夏日景象作了详尽描写，“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参天万木，千百里”，真是“旧貌变新颜”“江山如画”。《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中，“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夏日风情如此婆娑多姿，诗人寄情山水，快慰欣然。1955年夏，毛泽东登临杭州附近山峦，接连写下《五律·看山》《七绝·莫干山》《七绝·五云山》，尽情领略“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回首峰峦入莽苍”“此中听得夜莺啼”的闲情雅趣。1956年夏，毛泽东写下《水调歌头·游泳》，肆意抒发“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豪迈与从容。

秋： 万类霜天竞自由

“睹落叶而悲伤，感秋风而凄怆”绝大多数古代诗人将悲情愁绪与草木摇落、万物凋零的秋景联系在一起，尽管也有刘禹锡“我言秋日胜春朝”那样盛赞秋景的《秋词》，但悲秋无疑是中国古代文人吟秋作品的主基调。毛泽东对秋天情有独钟，有多首标明写于秋天的作品。《西江月·秋收起义》中“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暮云愁”并非个人愁苦，它是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的诱因，也是意欲彻底改变的社会现实。《清平乐·六盘山》中的“天高云淡”，表达红军过了岷山之后“柳暗花明”的心境。《五律·喜闻捷报》中的“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西北野战军连获大捷，秋风淡定，秋景壮美。《浪淘沙·北戴河》中“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不见半点悲凉凄怆，只有新社会日新月异的豪迈与激越。

毛泽东诗词脱尽自古人悲秋的窠臼，展现寥廓豪迈的艺术境界，彰显出超凡脱俗的人格魅力。《沁园春·长沙》是一篇游故地而观秋景、忆同窗而思往事、励斗志而抒豪情的壮美词章。写秋景而不哀飒，忆往事而不惆怅，纵横捭阖，大气磅礴。特别是身处逆境时写的《采桑子·重阳》，有沉郁的思索，但绝无怨天尤

人的牢骚与哀叹。“战地黄花分外香”，将诗的主题升华为对革命战争的礼赞。“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充满“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战斗激情。

冬： 梅花欢喜漫天雪

毛泽东戎马倥偬，历尽千辛万苦，但反映最多的却是雪天。“满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是一幅雄壮的雪里行军图，刻画出红军高昂的战斗激情以及冒雪行军的雄壮气势。长征途中红军所遭遇的雪更加威猛，但《七律·长征》中只有简约的一句话，“更喜岷山千里雪”。“更喜”二字把“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大无畏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念奴娇·昆仑》中，常年积雪的昆仑山“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毛泽东誓言剑劈昆仑，决心改造世界、造福人类，实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崇高理想。《七律·冬云》折射了毛泽东对雪的复杂心态：一方面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恶势力来势汹汹，形势严峻；另一方面是“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寓意共产党人坚贞不屈，风骨凛然，而反动派贪生怕死，不堪一击。

毛泽东读陆游《卜算子·咏梅》“反其意而用之”。陆游眼里的梅花消极退隐、凄凉愁苦。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盛赞梅花“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一“俏”一“笑”令人耳目一新，反出了骨力遒劲、伟岸飘逸的艺术神韵。“飞雪”是迎春使者，是险恶环境，是严峻挑战，是困难局面，是搏击战场。

《沁园春·雪》是毛泽东的巅峰之作，被柳亚子称赞为“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千里坚冰封冻，万里雪花飘扬，山峰绵延像银蛇舞动，高原相接似白象飞奔。面对银装素裹的大好河山，回忆起中华民族灿烂悠久的文明史，毛泽东激情澎湃，视通万里，思接千载，从指点江山到评点人物，一气呵成。



留学：“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改革开放也打开了对外交往的大门，出国留学成为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倡议，中央政府决定拨出财政专款（每年约3000万美元），用于在全国范围内扩大派遣公费出国留学人员，由此掀开了我国历史上出国留学工作新的一页。

1979年，在山东胜利油田工作的王哲然被公派到美国学习。在一年多的出国学习期间，他和妻子互通了140多封家书。6月18日，他在美国转机，抵达得克萨斯大学。“最突出的第一感觉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步伐确实快，时间安排相当紧凑，效率很高，当然也显得相当紧张。学校派了几个人专门安排我们的日程，想得很周到，很仔细，从衣食住行到学习、生活习惯都考虑到了。”（1979年6月24日致妻子秀珍）“这次出国学习机会，是我盼望已久的，也是经过了艰苦努力和不懈奋斗得来的。我非常珍惜这个机会，我没有理由不在保证健康的前提下集中更多的精力争取学习点有价值的知识。”（1979年7月25日致妻子秀珍）

1980年至1985年，还有近万人选择自费出国留学。来自北京的周西葇就是其中的一个。之后的1986年至1990年间，中国内地自费出国留学人数达13万，是上一个5年的13倍。

周西葇的父亲周明镇，1980年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被国际古生物学界尊称为“中国的恐龙之父”。周西葇在美国期间，父亲先后给他写了100多封家书，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各方面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目标不能，绝对不能放在挣钱上（意即不争眼前小利）。当前是学习和争取信誉，要埋头利用叔叔的帮助，为长远打下切实的基础，但至少在半年内，力求打下坚固的学习基础和肯干活不计报酬的信誉基础，这是比什么都重要。……什么都可靠人，只有知识要自己学，信誉要自己努力。有了这二者，挣钱也就不难，换学校、找工作也容易了，选择面也广了。”

1980年代初出国留学，最大的压力首先是钱，即使是院士家庭也不例外。周明镇在这封家书的开头就提到生活费用问题，明确指出经济上的紧张，使儿子能够体会到担保人对他照顾的可贵，要求他尽快在美国站稳脚跟，以减轻家庭的负担。1985年当“出国风”刮得正劲时，周西葇学成之后却毅然回到了祖国，创办自己的企业，亲身参与到市场经济改革的大潮中去，实现了自身的价值。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已达51949万人，目前有14541万人正在国外进行不同阶段的学习和研究，留学归国人员共计31320万人。而海外归来的中国留学生，正在用各自的力量推动并影响着中国的发展。

两岸：“故乡的泥土最芳香”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积极举措促进两岸交流。1979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两岸同胞开展交流交往。5月，大陆开始全面开办寄往台湾的平信业务，6月开始受理挂号函件，两岸通邮实现了历史性突破。1988年3月，台湾民众给大陆亲友的信件可由台湾红十字组织经香港邮局

转寄大陆。1989年6月起，台湾邮政部门开始直接收寄大陆的信件。

1987年5月28日，吉林省通化矿务局沟沟煤矿第三小学副校长马友联突然收到一封美国来信。他急切地打开了信，一看是二姐马友德写来的：“友联：二姐离开家的时候你才五岁，没想到你还记得我，当我突然接到由李伟明先生请他弟弟李凯威先生带来你的信时，虽然你不能肯定是否能找到我，李先生找了一年才找到我，当我看到时却是如获至宝，家书抵万金，虽是欲哭无泪，我看了又看，不知看了多少次。想想要快点告诉你们我还活在这个世界上，让你们知离家四十年的游子如今的情况。”1948年，正值花季的马友德考取了在上海的国防部医学院高级护理系读书，1949年随校迁至台湾，从此骨肉阻隔。马友联坚信二姐还活着，从1960年开始寻找，到处刊登寻人启事，寻找了27年，终于在台湾找到了离家近40年的二姐，双方开始通信。从1988年5月至今，马友德女士先后多次返回大陆探亲、旅游，为促进两岸民间交流作出了贡献。

1988年4月，居住在北京的刘国强收到了台湾八叔写来的一封信家书。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家乡一草一木的怀念和亲人的牵挂：“现在开放探亲，等你国华弟学业告一段落，我会搭机直飞北京，探望所有的亲人。去年我已从学校退休，身体很好，平时除运动外就是看书写字，或指导你弟弟妹妹功课，有时看看故乡亲人寄来的信和照片，以慰思乡之苦。‘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三年不见，东山犹犹其远’，何况分隔四十多年呢？”

刘振海1920年生于山东省武城县（今河北省故城县）。他的父母生了10个孩子，八儿两女，刘振海排行第八。自幼失怙，是几个哥哥把他抚养成人，送他读书。他在给侄子的信中说：“记得最后一次见到你父母及大姐哥哥们是在一九四六年春天的老家，尔后天涯海角，失去联系。虽然分割这么多年，但永远割不断亲情，永不会忘记生我养我的地方，故乡的泥土芳香，故乡的水甜美，走遍全球只有故乡最美好。‘客游虽云好，不如计归程’，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全家回去祭拜刘氏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并和子侄辈一叙别情。”

此后，刘振海与侄子刘国强等家乡人频繁通信，以慰思乡之苦。1992年5月2日，72岁的刘振海偕台湾妻子陈淑淑返回祖国大陆探亲，回到了老家山东祭祖，与兄弟姐妹及亲戚团聚。在近半个世纪的分离之后，骨肉再次相聚，酸楚和喜悦的泪水久久交织在一起。

2008年12月15日，两岸海运直航、空运直航、直接通邮正式启动，实现“三通”。

下海：“深圳确是一个大舞台”

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发展，不少人主动离开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告别按部就班的生活，投身商海，被称为“下海”。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国企干部抛弃了“铁饭碗”，投身私营工商界，全国掀起了“下海”热。

1990年9月，高伟从西安一家国有单位辞职，奔赴深圳特区，在一家中外合资服装厂从事管理工作。在写给爸妈的信中，介绍了他的“下海”

家书中的改革开放记忆（下）

□ 张丁

感受：“现在我已进一步体会到深圳确是一个大舞台，而且比内地要大得多，每个人都有风险和危机感，过去的资历在这里没用，很多在内地是风云人物，到了深圳也只能委曲求全，也有有的在内地默默无闻，在深圳却取得成就。我是下定决心要在这里干一场，和许多内地来的人一样，结果如何不去管它。总的说来，比内地活得痛快。”（1991年6月11日高伟致爸妈）一年以后，他的妻子也来到了深圳工作。高伟通过努力，得到老板的赏识，被提拔为公司副总经理。“转眼我来深圳已一年半了，在这里视野要开阔的多，学的新东西也很多，当然机会也多一些。但在深圳我最大的收获是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切都不向国家伸手，不靠领导，需要的只是改革开放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创造一切。”（1992年1月28日高伟致爸妈）多年以后，高伟的父亲高御臣老人谈到儿子当年的人生选择，坚定地说：“我觉得他不应该后悔自己的选择！”

应该说，“下海者”都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他们敢于抛弃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相信政策，相信市场，相信自己的能力，勇于挑战风险和未知，依靠勤劳苦干，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他们搏击市场，开拓创新，使社会保持活力，推动改革开放的伟业不断前行。家书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它就是一部民间视角的改革开放史。限于篇幅，本文只能选择几个观点，撷取几个片段，回顾一下这段火热的历史记忆。作为信息沟通的载体，家书已在我国传承数千年，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中，在科技发展的更新换代中，家书也经历了从日常必需品到悄然退出人们生活的巨大变化。

中国绘画讲求格物逼真，又讲求气韵和笔墨、自然生意。而气韵、笔墨与形象的塑造是分不开的。形与意，即“似”与“不似”，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绘画以宋分为界，宋之前，画家的笔墨讲究外求，追求一个“似”字；宋以后，逐步走向内求的“不似”，并以此为形质，出现了元四家、明四家、徐青藤等一大批写意画家。

不论刻意“求似”的绘画导向，还是刻意“不求似”的绘画导向，似乎有意把中国画的发展引向一条独木桥，而艺术本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轼在《书鄧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

无边春。”意思是评论画的高低优劣，如果仅以像与不像为准，那就跟孩子差不多——太幼稚了，是一种很没水准的见解。表面的“似”是“一点红”，虽无“非似”，却可感受到“无边春”，“天工与清新”正是格物求真、形似意生的体现，即“似而非似”。元代画家倪瓒在两段画跋中写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可见，绘画既要严谨、逼真，又要以“似”为载体兼具“不似”的

“胸中之逸”的价值。元末明初，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解释倪瓒的“不求形似”，认为“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继而石涛在《大涤子题画诗跋》中明确提出了“不似之似”。他说：“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名画神奇懵懂间，不似之似当下拜。”“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画松一似真松树，予更以不似之似似之，真在气，不在姿也。”也就是说，绘画不是一味地模仿自然对象，绘画艺术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是艺术家

抓住对象的特征加以提炼、概括，是写实和抽象二者不同程度的结合，蕴含了客观物象的本质特征，达到“形似之妙，妙在神似”的审美意象才有艺术存在的价值。

齐白石“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独特见解，已成为近代中国画追求“神似”（尤其是写意画）的一条美学原则。意思是说描绘对象（色、形）不能不像，也不能太像。太不似失去了艺术“真”的根本，观者看不懂、理解不了画的意思，就等于欺骗世人，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观赏者的共鸣；太似是艺术家放弃对自然与生活的概括提炼，把写生看做绘“标本”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创作的艺术作品俗气直白没有品位，不能给观者以回味和遐想的空间。中国画精道应在二者之间，有“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想象愉悦，水墨“以情入画”，气韵生动，真率雅致，酣畅淋漓，动中藏静，收放自如，用墨深浅有度，用色显而不飘，画面把控灵动，彰显稚朴气息，胸中有清越之气，笔底有隐隐

中国绘画讲求格物逼真，又讲求气韵和笔墨、自然生意。而气韵、笔墨与形象的塑造是分不开的。形与意，即“似”与“不似”，如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中国绘画以宋分为界，宋之前，画家的笔墨讲究外求，追求一个“似”字；宋以后，逐步走向内求的“不似”，并以此为形质，出现了元四家、明四家、徐青藤等一大批写意画家。

不论刻意“求似”的绘画导向，还是刻意“不求似”的绘画导向，似乎有意把中国画的发展引向一条独木桥，而艺术本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苏轼在《书鄧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

无边春。”意思是评论画的高低优劣，如果仅以像与不像为准，那就跟孩子差不多——太幼稚了，是一种很没水准的见解。表面的“似”是“一点红”，虽无“非似”，却可感受到“无边春”，“天工与清新”正是格物求真、形似意生的体现，即“似而非似”。元代画家倪瓒在两段画跋中写道：“仆之所谓画者，不过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余之竹聊以写胸中逸气耳，岂复较其似与非……”可见，绘画既要严谨、逼真，又要以“似”为载体兼具“不似”的

“胸中之逸”的价值。元末明初，王绂在《书画传习录》中解释倪瓒的“不求形似”，认为“不求形似者，不似之似也”。继而石涛在《大涤子题画诗跋》中明确提出了“不似之似”。他说：“名山许游未许画，画必似之山必怪；名画神奇懵懂间，不似之似当下拜。”“天地浑融一气，再分风雨四时；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似似之。”“画松一似真松树，予更以不似之似似之，真在气，不在姿也。”也就是说，绘画不是一味地模仿自然对象，绘画艺术作品中所塑造的形象，是艺术家

抓住对象的特征加以提炼、概括，是写实和抽象二者不同程度的结合，蕴含了客观物象的本质特征，达到“形似之妙，妙在神似”的审美意象才有艺术存在的价值。

齐白石“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的独特见解，已成为近代中国画追求“神似”（尤其是写意画）的一条美学原则。意思是说描绘对象（色、形）不能不像，也不能太像。太不似失去了艺术“真”的根本，观者看不懂、理解不了画的意思，就等于欺骗世人，是一种

不负责任的行为，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观赏者的共鸣；太似是艺术家放弃对自然与生活的概括提炼，把写生看做绘“标本”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创作的艺术作品俗气直白没有品位，不能给观者以回味和遐想的空间。中国画精道应在二者之间，有“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的想象愉悦，水墨“以情入画”，气韵生动，真率雅致，酣畅淋漓，动中藏静，收放自如，用墨深浅有度，用色显而不飘，画面把控灵动，彰显稚朴气息，胸中有清越之气，笔底有隐隐

风雷之声。

由此，绘画的成功之处就是找到了似与不似之间的巧妙连接，“以一管之笔，拟大虚之体”，抒发着其对自然与生活的深刻体验以及独特的创作思想，形成中国画特有的“似与不似”美学形式和美学内涵。作中国画在“似与不似”之间为妙，模仿并不高明，创新才是正道。模仿是创新的基础，创新从模仿开始。看中国画，重在“似与不似”之间感受那种体现在画中的中国精神和绘画大师的意趣追求。

